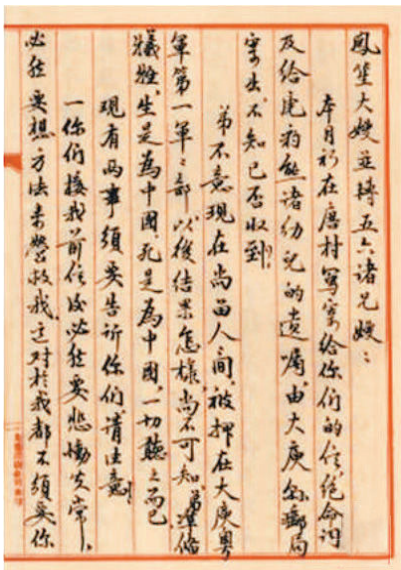




刘伯坚写给亲属的遗书

援外医疗队:新中国公共卫生外交事业的起点

□ 罗元生

在卫生领域开展国际合作，是中国公共卫生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援外医疗队，则是新中国公共卫生外交事业的起点。

新中国成立初就开始了对外援助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当月底，胡志明到北京向中国求援，尽管中国百废待兴，但仍“对他们的要求均给以满意的答复”。

1963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非洲朋友时进一步表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实效，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等基本原则，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和好评。”

中国对外援助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注重发展和民生的实效，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等基本原则，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和好评。

1950年以来，中国向亚洲、非洲、东欧、拉美和南太平洋地区的160多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帮助受援国建成了近2000个与当地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项目，约10万名各国官员及管理技术人员来华参加培训和研修。

新中国第一个回应阿尔及利亚的请求

1962年7月，位于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长期的浴血斗争，摆脱外国殖民主义者长达130多年的统治，赢得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新生的阿尔及利亚政府面对弹痕累累、满目疮痍的现实，急需医治战争创伤，发展民族经济，填补西方医生撤走后留下的医疗空白，解救疾病缠身、求医无门、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平民百姓。当年底，阿尔及利亚政府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全世界发出了紧急呼吁。

1962年12月中旬的北京后海，结着厚厚的冰。后海北沿44号的卫生部大院里，一个贴着国际邮票的狭长的白色信封，摆在了卫生部办公厅对外联络室29岁的工作人员钱君琦的办公桌上。

这是一封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部长穆罕默德·纳卡叙亲笔签名的信函，由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通过外交部转来，还附有大使馆致卫生部的一封简短公函。2012年4月下旬的一天，钱君琦回忆，由于当时室里没有相应语种的翻译，她临时找人翻译出了这封信函。原来，阿政府请求中国派医疗卫生代表团访阿，并希望中国派出医疗队长期在阿工作，提供具体的医疗援助。钱君琦立即将两封信函

在中央档案馆馆藏中，有一封革命烈士刘伯坚写给其亲属的遗书。潇洒的笔迹中“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豪言壮语，今天看来依然感人至深，信中谆谆嘱托自己的孩子要继续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充分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催人泪下的家国情怀。

1935年3月4日，江西省信丰县塘村山区发生了一场红白两军进行包围与突围的恶战。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部队，将头晚宿营于此的中共赣南省委、省军区2000余人重重包围。率队突围的红军将领刘伯坚——这位早年曾留学苏联、在冯玉祥西北军中享有“军中骄子”之誉的红军高级指挥员，最终在激烈的战斗中身中数弹，不幸负伤被捕。

在狱中，刘伯坚自知必死无疑，3月16日给亲属写下了遗书，内容如下：

凤笙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

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信，绝命词及给虎、豹、熊诸幼儿的遗嘱，由大庾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

弟不意现在尚留人间，被押在大庾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现有两事须要告诉你们，请注意！

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恸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须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于、邓虽然同我个人感情虽好，我在国外叔振在沪时还承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须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须要把我这件小事秘

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至嘱（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

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荒漠黄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雩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廿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五十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贱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照梯。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寄交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还不致于饿死。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

下医疗队的工作汇报。”

然后，周恩来又大声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听说你们的工作很不错嘛，要继续努力，为祖国人民争光。”听到周恩来的这一席话，大家顿时觉得一股暖流涌入全身。

周恩来和陈毅在奥兰市只停留了一天，主要参观了奥兰市的北非玻璃制造厂和阿尔及利亚压缩液化气厂以及一个农场。按照预定计划，医疗队队员一直伴随在代表团左右。

在参观压缩液化气厂时，周恩来饶有兴趣地询问了许多技术细节。在厂会议室，当阿方人员介绍情况的间歇，周恩来回过身来，对陈海峰说：“本来我是想挤出一点时间，听一下医疗队的工作汇报的，但看来实在是抽不出空来了，只好委托陈毅同志专门听取你们的汇报了。”随后，他就与陈毅打了个招呼。

陈海峰向陈毅和乔冠华简要汇报了医疗队在阿尔及利亚的工作情况。陈毅听后，对医疗队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鼓励医疗队继续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参观结束后，医疗队队员陪同周恩来一行返回奥兰市宾馆。

在奥兰市的当天，周恩来因感冒正发着高烧，但他没有跟任何人讲，只跟陈海峰要了点抗感冒的药。他一直坚持进行国事访问，直到返回奥兰机场，还在机场与阿方有关方面进行紧张的双边会谈。

尽管身体不适，周恩来却没有忘记医疗队的同志们。会谈一结束，他就来到医疗队队员的身边，对大家说：“你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派到国外工作的第一批医疗队，既光荣，任务又十分艰巨，而且，面临的许多困难基本上要靠你们自己来克服。中央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战胜困难，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群众防病治病作出贡献。”

周恩来还叮嘱医疗队队员要“学习发扬白求恩精神”，“更好地工作，把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健康当作中国人民的健康一样对待”。说完，周恩来与医疗队队员在机场前厅合影，并邀请本·贝拉总统一起合影留念。

周恩来在登机前，还特意与医疗队每个队员逐一握手，表示感谢。当他走上舷梯时，又突然回过头来，对医疗队队员们大声说：“希望你们都为白求恩式的医生。”

由于队员们的优秀表现，在阿方政府的强烈挽留下，中国援阿医疗队从最初约定的半年延长为两年。

（摘自2020年第9期《党史博览》）



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了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从这封遗书中可以看到，刘伯坚为了维护党的声誉，希望自己的亲人不要把自己被捕的事扩散出去，反映了他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性格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

几天后的3月21日，刘伯坚壮烈牺牲在江西省大余县金莲山，时年仅40岁。

从以后收集到的信息可以看出，从被捕到牺牲，刘伯坚共给亲人写了四封书信，其中三封反复嘱咐兄嫂找到虎、豹、熊三个儿子以及对他们的期望。最后一封信是写给他的爱人王叔振的，信是这样写的：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陝西凤笙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我

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

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日于大庾

然而，刘伯坚并不知道，在他写这封信之前，对党和革命无限忠诚的妻子已先他一步在闽西游击区光荣牺牲了。

刘伯坚、王叔振的三个孩子都在难以尽述的艰难中长大成人，并先后被中央找到。1979年5月，刘伯坚、王叔振这对著名的革命夫妻，在双双壮烈牺牲44年后，他们的三个儿子在北京聚首，三个男子汉紧紧拥抱在一起，沉浸在悲恸、激动、自豪的复杂情绪中，这种情绪过后，重新涌聚在三兄弟心中的，是对父母无尽的缅怀。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刘伯坚生前留下的几封遗书，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亲人与革命伙伴的眷恋与不舍，更体现出一种为坚持理想信念不惜牺牲生命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激励着无数后来者奋勇向前。

（摘自2016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家国情怀：刘伯坚给亲属的遗书》）

小小铜锣铸忠魂

□ 麻文彬 徐知



黄麻起义时用过的铜锣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是红安（旧称黄安）传唱至今的一首民谣，简短质朴的24个字，浓缩了一部气壮山河的红安革命斗争史。

在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着一面黄麻起义时用过的铜锣。这面历经岁月洗礼的铜锣，与一根系着红布条的鼓槌均保存完好，成为红安革命斗争的见证。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9月下旬，中共黄安县委和麻城县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制订的《秋收暴动计划》，分别领导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的农军和农民群众举行暴动，开展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10月，中共湖北省委先后派符向一、王志仁、刘镇一、吴光浩等到黄安，建立中共黄（安）麻（城）特别区委员会，发动和领导两县的武装起义。

11月13日，黄安、麻城3万余名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和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以夺取黄安城。当晚10时，总指挥潘忠汝亲自整队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并挑选部分人员组成攻城突击队和尖刀班，准备里应外合。

在当地民众配合下，起义军浩浩荡荡地向黄安城挺进。这是一支穿戴不一、武器多样的起义队伍。据记载，当时走在最前面的是农民自卫军，他们胸佩红布条（时称“赤化带”），臂系白布条，肩扛着土枪。紧随其后的是义勇队，他们大多数拿的是长矛、鱼叉、镰刀、扁担等自制武器。队尾的是赶车驱马、富农人背的担架队、运输队。尽管武器装备简陋，但起义军革命斗志高昂，高喊着口号，义无反顾地向黄安城进军。

14日凌晨，起义军抵达黄安城西北门外，把黄安城围得水泄不通。随着铜锣的敲击声，潘忠汝一声“攻城”令下，叫喊声一片，土炮声、枪声四起。义勇队队员吴立行一马当先，攀梯而上。他刚爬上城墙，就被躲在城垛暗处的敌人一枪击中，从一丈多高的城墙上摔了下去，倒在血泊中。吴立行的牺牲激起了起义军的无比愤怒。吴先恩等数十名义勇队队员组成敢死队，争先恐后地攀上木梯，爬上城头，歼灭了驻守城楼的敌军，与吴光浩率领的攻城部队胜利会合。攻城的

缺口打开了，紧闭的城门砸开了，起义军如决堤的洪水从四面八方涌入城内。在阵阵铜锣声中，起义军活捉反动县长，全歼城内敌军，并砸开监狱释放了所有在押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将革命红旗插上了黄安城头。黄麻起义胜利后，黄安农民政府宣告成立。

在近30年的革命斗争中，大别山始终红旗不倒，火种不断，涌现出许多英雄儿女，铸就了一个个赤胆忠魂。大别山人民发扬“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的“一要不”和“困奉献，不图名、不图利”的“一图两不图”精神，数十万子弟前赴后继投身革命。仅红安一地，就有14万人英勇献身，后经查明登记在册的烈士就有22552名。1952年9月，黄安这座英雄的县城正式改名为红安，成为共和国唯一以“红”命名的县。铜锣声声，是革命先辈们对党忠诚的不朽誓言。

（摘自2023年6月8日《中国国防报》）